

变创 / 与 / 渐常

叶隼 著

侨易学的观念

所谓侨易，实际上更多地体现为交易的内容。因为有二元关系的相交，所以有侨易现象的产生。我们提出“侨易学”的概念，虽然也兼顾变易、简易的研究，但其核心部分则主要放在“交易”层面。也就是说，研究对象（侨易过程之主体）是如何通过“相交”，尤其是物质位移导致的“异质相交”过程，发生精神层面的质性变易过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会通丛书

变创与渐常

侨易学的观念

叶隼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叶隽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

(会通丛书)

ISBN 978-7-301-23362-7

I. ①变… II. ①叶… III. ①《周易》—应用—移民问题—研究—中国

IV. ① B221.5 ② D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8433 号

书 名：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

著作责任者：叶 隽 著

责任编辑：刘祥和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3362-7/G · 3729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pkuphilo@163.com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5217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A5 9.875 印张 240 千字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总 序

近代以来二百年，五四以来近百载；而1950年代以来六十余年的历史，又有三十年、六十年之说，总体而言，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坎坷曲折而望断江河，让人徒生“万古沧桑”的悲凉之感。时至当下，携经济改革之巨幅红利，举国皆曰“创新”，唯其词汇过于泛滥，乃另成新词焉；求真之学人反而不敢轻易提及。然而，创新之词，过于前卫，岂可滥用？四年之前，走出书斋，游走于欧洲田野上，乃有与彼邦精英的交流与交锋，深受刺激；归国语与立刚君，谓吾国之起兴于世界，必当先有思想之原创，启创辟之学，聚四方之智，乃能别开天地而为中国文化开新景，为世界文明寻出路。

深受刺激的不仅是撒切尔夫人的诘难，“今天的中国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其他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播影响的学说”。而对自身所处民族的质疑，也是自家反复不断追问的核心问题。我们这个民族，究竟是怎么了？毒奶粉、瘦肉精、药家鑫，还有在公众场合引爆炸药的、愤怒之下猛摔婴儿的、甚至有母亲弃置亲生女儿而至活活饿死的……我们还是那个有着黄帝之药、孔子之教、老子之道的民族吗？我们还是那个有着温柔敦厚美德、秉持温良恭俭让教诲的诗教之国度吗？鲁迅先生不是说过吗，“自古以来，我们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人的脊梁！”可

按照柏杨先生的说法，中国文化就是“酱缸文化”，我们中国人的孽根性始终也是存在的。这种两面性在任何一个民族或许都存在，可在中国这个文化体里表现得更是明显。可我们毕竟还有“一分为三”，我们怎样才能寻出那个能支撑全局、鼎立平衡的“三”来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子投江，乃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靖节远隐，乃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太白斗酒，乃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一浪漫的诗人行歌，乃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勾勒出一条清晰的传承轨迹。我们的诗意之思，其实涵盖了深厚的哲理内容，所谓“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是何等的意涵深刻呢？说我们是一个伟大的诗思民族，又有何不可呢？不仅如此，我们还曾建构了儒法互补的制度性结构，封建王朝长达两千年的稳定状态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基本路径，则构成了一组理解传统中国制度二元的有效思路；而礼教自上而下的严格律上，则可被视作是另一种制度性规训，可一旦礼教下延之后就导致了另一种结果：“礼教下延必然使礼教虚伪化，过去是上层，尤其本是士大夫特权的风教，变得俗不可耐。礼教覆盖面过大形成的张力反应使应负维持礼教责任的意义上层产生反礼教精神，意义上层与权力上层开始分化。”^[1]。人心之坏，不启于某一二个个体或群体的趋利冲动或孽根习性，而当始自整个制度环境的恶劣化。故此，持有中短期决定权力者当不慎之乎？

当鲁迅之死，郁达夫慨然叹曰：“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

[1] 赵毅衡：《礼教下延，色情上升：中国文化的“分层/逆反”机制》，载赵毅衡：《礼教下延之后——中国文化批判诸问题》第2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2]伟大人物的标识或许过于刺眼，但任何一个民族，缺少了在精神灯塔上执灯守候的人物，则必然缺乏前进的方向和动力。改造世界固然重要，阐释世界同样重要。所谓“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陈寅恪先生此言可谓见微知著，将枯坐书斋的学问与轰轰烈烈的历史巧妙地联系起来。这或许也正是他不管如何颠沛流离、受尽艰难而坚守学术的原因所在吧！当年他作诗云：“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今日读之，仍感慨万千，前贤已矣，我们后来者步履至此，能否对得起前辈的重托？所以，“吾侪所学关天意”，也还有另种阐释的可能。

或者我们更当追问的是，面对世相纷繁、人心不古，知识人竟当何为？坚守书斋或走向广场，如果换位而处，都不难理解。但说到底，知识人的本位仍应立定“纸上”，当年胡适与陈垣曾相对慨叹：汉学正统这时候在东京还是在西京（巴黎）呢？陈垣的这种学人岗位意识极为自觉，弟子回忆称：“援庵老师深以中国史学不发达为憾，常说日本史学家寄一本新著作来，无异一炮打到我的书桌上。”所以陈垣的部部著作，也未尝不可视作回击的“炮弹”。以其未曾接受系统教育的出身，有《元也里可温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元西域人华化考》等名著问世，汉学领军者伯希和乃称：“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这，或许就是知识人存在和坚守的意义！

故此，对于学人而言，守正求创乃是不易之道，而一方面接续

[2] 郁达夫：《怀鲁迅》，载“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10集，《散文集》，第20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

学统，一方面则需创辟发明。而以“侨易”为题，不仅是要关注因“侨”而致“易”的结构性过程，诸如空间维度的整合与时间维度的演进，物质位移、精神漫游与个体思想观念的形成与创生，乃至不同文化子系统如何相互作用与精神变形，更强调其作为思维方式的立意与哲思可能，标识一种理解思维和原创的方法，或许也自有其独特意义。

本套丛书强调中国学术与思想的原创力，邀请各学科具有理论思维自觉意识的前沿学者，就其长期治学并已在理论上有所发覆的代表性人物，以短小精悍之篇幅言简意赅地叙述其理论思考，提出一家之言。强调大家之小书意义，高深学理思考的通俗化阐释，所思则关系学科乃至学理的重大原则，所述则希望能春风化雨，为学界各科同仁所共享；在此基础上，希望能引发学界共鸣，展开深入的理论探讨，或可使中国现代学术缺乏理论原创的批评不致真的成为现代中国崛起的致命之伤。在具体的操作方面，则不拘一格，或以春风化雨的方式使高明思想“飞入寻常百姓家”，或以体贴家常的白话构建学术对话的桥梁，当然也不避艰深的学理阐释、哲性建构……。总之，其人其书未必一定深究天人之际，却需略通古今之变、东西之别，只要在学理层面有一孔之见、有新发之得，皆在欢迎之列。希望积少成多、集腋成裘，通过作者、编者、出版者长期有效的合作，能建成一个让外来者不容小觑、见之瞩目、乐于引介的“中国思想的活力资源库”。

叶 隽

作于2013年1月9日—11月5日，其间旅德、赴港、去台，经历酷暑，诸种跋涉，而终成此稿，精神疲惫犹不堪言，处承平之世，而忧怀江湖；图创辟求学，究天人之绝。书生意气，终究纸上苍生而已；感慨系之，漫卷天边云淡云舒。

序

最初听叶隽君说“侨易学”，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当时谈的并不深入，我只意识到“侨易学”对跨文化研究，可能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没有进一步追问所谓“二元三维—大道侨易”的本体论意义。有“术”无“道”，毕竟浅薄。最近读完《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书稿，才开始在“整体性思维”意义上深入理解叶隽君的“侨易学”概念，越发钦佩其治学志向高远，功力深厚。

《变创与渐常》是一部理论奠基性著作，首先要明确的是“侨易学”的基本概念。“侨易学”的理论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易经》，基本理念就是因“侨”而致“易”，前者强调空间维度的整合，后者关注时间维度的演进，其中既包括物质位移、精神漫游所造成的个体思想观念形成与创生，也包括不同的文化子系统如何相互作用与精神变形。侨易学三条基本原则：一为“二元三维，大道侨易”、二为“观侨取象、察变寻异”、三为“物质位移导致精神质变”，既可以理解为认识论原则，又具有方法论意义。“侨易学”是一种体现着“大设计”精神的理论。

学术贵在自立门户，但又不囿于“门户之见”。“侨易学”概念既有开创性，又有开放性。本书分上、中、下三篇，在一般理论原则确立之后，“侨易学”还必须具有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叶隽君多年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这些研究不仅检验了“侨易学”理论的有效性，也拓

展了“侨易学”的理论视野，为其提供了阐释的多样性可能。“侨易学”仍是一个发展中的理论，甚至只是一种“假设”，期待着学界的进一步论证与阐发。

最初知道叶隽君研究卫礼贤，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以后又读到他研究留学史与德国古典美学的著述，感佩他的博学慎思。这些年他著述甚丰，一度患眼疾，典型的“学术之伤”。2009年初，在人大水穿石咖啡馆里，与他和夏可君聊天，听他们谈吐高妙，多惊人语，我意识到做学术贵在有锐气，锐意一旦消磨殆尽，大概只能写写无关痛痒的“杂文”度日了。

叶隽君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这个学术“沸腾”的时代，那里还算个清静之地，可以容下学者的“自在”生活。叶隽君的学术做得从容不迫，这些年每次见到他，他都用同一种舒缓平静的语调谈论读书和写作，去年底在鼓浪屿开“中国大学的创校理念”研讨会，再次遇见他，得知他的《变创与渐常》完稿了，为这部书，他想了五年，写了三年。我还记得他在林文庆别墅石阶前说这番话的表情，谦逊的喜悦，多么美好的学者本色。

叶隽君处承平之际，却力为创辟之学，我不知道学界理解、接受他的学说需要多少年，期望更短，也可以等待更长，毕竟思想的确立与流布，不是三年五载的事。叶隽君勉力，学友们守候，一如既往。

是为序。

周 宁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13年5月31日于厦门大学

目 录

总序 / 1

序 / 5

上篇 观念与方法

第一章 侨易学的观念 / 3

- 一、侨易学的缘起：前贤的启迪与发凡 / 3
- 二、作为理论/哲学的侨易学：“二元三维一大道侨易” / 9
- 三、作为学科 / 领域的侨易学：基本概念与核心内容 / 17

第二章 侨易学的方法 / 31

- 一、作为方法的侨易学：观侨阐理、取象说易、察变寻异 / 32
- 二、侨易学的理论分析模型 / 34
- 三、整体文化（东、西方文化）生成过程的侨易学视域：
兼论侨易学元思维的“侨易二元” / 40

第三章 游戏·博弈·侨易 / 63

- 一、游戏精神之逍遥 / 63
- 二、博弈状态之喧嚣 / 73

三、侨易方法之重要 /80

中篇 侨易现象

第四章 侨易现象的概念及其内涵与外延 / 89

- 一、侨易现象既非单纯的位移现象，也非纯粹的思想现象，
而是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的结合 /89
- 二、侨易现象的动态过程与静态确立 /95
- 三、侨易现象与各相关学科的关系 /100

第五章 作为研究对象的侨易现象 / 107

- 一、侨易主体的分类：侨易个体、侨易群体与侨易共同体 /107
- 二、侨易现象的分类——以活动类型为标准 /111
- 三、侨易事件与侨易过程 /116

第六章 侨易现象的规则性问题 / 119

- 一、观察与把握侨易现象的规则（主观、客观、中庸） /119
- 二、区分与解释侨易现象的规则（规则现象、异则现象） /126
- 三、确定与检验侨易现象的规则 /131

下篇 案例研究

第七章 思想形成的人文底蕴、社会场域与文化地理

——若干个案的侨易学简析 / 143

- 一、作为侨易现象的魏时珍、王光祈、郭沫若、宗白华等 /143

二、取象说易：普遍性与特殊性 /155

三、观念构型与场域作用：知识形成与思想变易的现代意义 /163

第八章 中国文化的“精神三变”

——侨易学视域的整体性个案分析 /178

一、精神三变以及作为个性整体的“文化单元” /178

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成就一个文化区的中坚思想民族 /189

三、对“民族文化单元”的元思维追索：以其中坚性、
代表性为中心 /200

第九章 侨易学学域的展示：留学史、文化下延、传统承续 /231

一、留学史的侨易学意义 /232

二、文化下延的侨易学观察 /241

三、传统承续的侨易学阐释 /253

结 语 /268

一、现代性、全球化语境中的侨易学意义 /268

二、侨易学的中国意义 /272

三、“道变”与“求和” /280

后 记 /284

主要参考文献 /287

上
篇

观念与方法

第一章

侨易学的观念

一、侨易学的缘起：前贤的启迪与发凡

李石曾（1881—1973）撰有《侨学发凡》一文，称发明一种新的学问为“侨学”。何谓“侨学”？“侨学为研究迁移、升高、进步的学问”^[1]；“侨学是一种科学，研究在移动中的若干生物，从此一地到彼一地，或从几个处所到另一个处所；研究他们的一切关系上与活动上所表示的一切现象”^[2]。应该说，在传统的移民现象之外，发掘出侨学的概念，是有贡献的，因为它使我们意识到，人类由迁移活动中所产生的复杂变化，不是一个简单的移民所能概括的。

《易经》是华夏民族的经典源泉，这一点亦为西方学者所认知，如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就强调《易经》是中国文化的发源所在：“……我们可以断定，在《易经》之中，凝聚了千年之久的最成熟的智慧结晶。这样的话，认为中国哲学的两大主流，即儒家与道家的共同思想源泉在此处，那也就不足为奇了。”^[3]《易经》思维的重要特点，就是

[1] 《侨学发凡》（1942），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李石曾先生文集》上册第296页，台北，1980年。

[2] 《侨学发凡》（1942），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李石曾先生文集》上册第332页，台北，1980年。

[3] 德文为：“……so daß man ruhig sagen kann, daß im I Ging die reifste Weisheit von Jahrtausenden verarbeitet ist. So ist es denn auch kein Wunder, daß beide Zweige der chinesischen

“变”；但其实非仅“变”字而已，所谓“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4]，钱锺书撰《管锥篇》，第一篇文字即论“易”，未尝不含深意。所挑者固为中国传统的经典源泉关键词，在阐释过程中，更蕴涵着对西方大哲的挑剔与批评，背后隐含的未尝不是一种“学人挑战”的姿态。对于这种一字多义的现象，钱锺书批评黑格尔说：“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之。”^[5]诚哉是言，乃是学人浸淫书本而得自由出入后的体味之语。若则学人能立定求知之本义，力戒场域之中“老师巨子”身份局限之所致病，或可努力接近求知求真之原相原义。

但关于“易”的含义，则有多种解释。譬如易之三义被认为是并非原初性的东西，不易之义乃是后人所加。此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也不必强求一律。但凡大本之道，就在于其给后世的无尽阐释性空间。但这里应当特别强调的是“交易”的意义，有论者就认为《易经》表达了三个方面的哲学思想，即：观物取象、万物交感、发展变化^[6]。这里主要就万物交感略加阐述，所谓“万物在阴阳两势力的推动、矛盾中产生变化，变化的过程是通过交感”，那些“吉”卦往往是上下两卦具有交感性质，而“凶”卦则反是^[7]。所谓“一阴一

(续上页) Philosophie, der Konfuzianismus und der Taoismus, ihre gemeinsamen Wurzeln hier haben.““Einleitung”(导论), in Richard, Wilhelm (übertr. u. hrsg.): *I Ging-Das Buch der Wandlungen* (易经). Düsseldorf Köln: Eugen Diederichs Verlag, 1981.S.9.作者自译。

[4] 郑玄《易赞》《易论》，见钱锺书：《管锥篇》第1册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当然还有一种“日月合一为易”的说法，具体解释如“日月为易，象阴阳也”（《说文》）。参见《蔡尚思论〈易经〉》，载蔡尚思：《十家论易》第5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5] 钱锺书：《管锥篇》第1册第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6] 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1卷第23—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7] 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1卷第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20页，载周振甫：《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阳之谓道”，必须是在交互作用的合力之下而产生，所以交易是很重要的一点，必须有交互相关的一面，方才有易变的可能。故此，侨易之立名，也包括交感的意思在内。即侨化的过程中，理所当然地就涵盖了交互的意思，达到交感的作用。所以，我将其再做变通，乃易有三进，一为变易、二为交易、三为简易；道乃不易，大道不易。这或许可与老子所言相互发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8]

事物的“变易”乃是生生不息的过程，凡有宇宙客观之存也，则变易为万世之理，纵然表象为静态，其内部亦始终在运动之中；“简易”表现的是大道至简，最复杂的过程呈现可能最后落实到原理层面，则仅为言简意赅甚至公式表现的公理、定义而已，甚至其根本性之原则均有其“不易”的一面；而“交易”则是变易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就是因较大异质性的环境（context）变化而导致的事物

[8] 印度学人亦称：“‘真理’，独一而永恒者也。世间万事万物之理皆由此出，依此而明，据此而得其所，此‘真理’者，吾人之所求也。”〔印度〕室利·阿罗频多（Aurobindo, Sri）：《薄伽梵歌论》（*Essays on the Gita*）第3页，徐梵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关于“一—二—X—万物”的过程，大致无异议，但作为中介的X究竟是三还是四、五，有不同说法，譬如北宋邵雍（1011—1077）就根据《周易·系辞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生成法，将万物皆按“四象”归类，建立了四分宇宙结构图。按照他的说法：“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动之始则阳生矣，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一刚一柔交而地之用尽之矣。动之大者谓之太阳，动之小者谓之少阳，静之大者谓之太阴，静之小者谓之少阴。”（邵雍《观物内篇》）如此，则天地两仪生出“阴阳刚柔”四象，表现为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张其成：《象数易学》第342—343页，北京：中国书店，2003年。周敦颐（1017—1073）则通过《太极图说》构成了一个由五行而生万物的逻辑链：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有论者认为，这一思路虽然“从‘阴阳’到‘五行’表面上看是‘二生五’，属于‘二生三’系统，实际上是分出两对阴阳加上中‘土’，同样是‘一分为二’思想的产物。”张其成：《象数易学》第307页，北京：中国书店，2003年。